

浅析明中后期海防废弛与倭寇猖獗

田秀娟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明代初期,政府十分重视海防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明朝形成了以海上的巡逻和陆上的警戒、城池的防守相配合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海防体系,这时倭寇没有酿成大祸。但是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军队实力的消弱,海防逐渐废弛,倭寇日益猖獗给明廷和沿海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关键词] 明朝;海防;倭寇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02(2008)11-0046-03

一、明初期的海防建设

明初,由于倭寇侵扰,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为了消除方国珍、陈友谅等海上残余势力,明朝政府非常重视沿海的防务。从洪武初年开始,明政府就着手加强沿海的防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明朝形成了以海上的巡逻和陆上的警戒、城池的防守相配合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海防体系。

明朝大陆的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南与安南接界,全长 1.8 万公里。明以前,沿海并没有完善的防御体系和防御设施,而且在宋以前的设防主要是针对本国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其他民族的,元朝时,沿海设立了较多的防卫,有的是针对倭寇,但元朝在沿海的设防主要是为防卫国内“盗贼”的,也没有形成海防体系,随着元朝的灭亡,这些海防设施也不复存在。在倭寇不断侵袭沿海的情况下,朱元璋一方面用现有的军事力量进行防御,一方面白手起家来建设海防。基本措施是:其一,增强水军,造战船,置水寨。其中最为重大的决定有二:一是洪武三年(1370)七月“壬辰,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繕理,遇征调则益兵操之”。^{[1][2][3]}这样使水军在过去的基础上更加强大和正规。这支拥有 13 万多将士、1200 艘战船的庞大水军,是中央直属部队,担负着沿海地区的机动作战任务。一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4][5]}这一决定使得沿海 50 多卫、80 多守御千户所和 300 多巡检司至少拥有 3500 多艘战船,是一支十分可观的水上力量。这支水上力量属于各个卫所和巡检司,是地方水军,防守各自的分区。其二,建立沿海卫所,建设沿海防御设施。卫所是明前起军队的基本编制,有在京卫所、在外卫所和特设卫所。除特设卫所外,一般都隶属于都司,

统于都督府。随着倭寇对沿海的侵扰,防卫沿海地区的卫所、城寨、巡检司与烽堠墩台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其三,选拔御倭将领,实行信赏明罚。在永乐、宣德年间不断改善和加强海防建设,这时的沿海的设防已经相当地完备了,以后各朝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个别做了些调整罢了。这些措施有效地抵御了倭寇,因此在明初倭寇入侵并没有酿成大祸。

二、明朝中后期倭寇猖獗与海防废弛

明朝中后期以后倭寇日益猖獗,特别是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是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次数多,时间长,规模大,地域广。二是构成贼寇的成分这一时期主要是日本海盗和中国的海盗,而中国人中出现了名噪一时的几名海盗大头目,例如王直、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萧显、方武、徐海等十余人。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依附于倭寇的“小民”。这些倭寇除侵略南直隶、浙江之外,还蔓延到了福建、广东一带,当时侵略中国沿海的倭寇多为日本武士,他们杀人、抢劫财物,非常残暴。只要他们所到过的地方,男丁女妇都会被他们劫掠,金银财宝被他们抢光,城镇房屋被他们烧毁,甚至还发掘坟墓求资赎尸。

倭寇在当时的东南千里的海滨肆意烧杀抢掠,明廷的半壁河山几无宁土,广大沿海居民惨遭荼毒,明初海防比较牢固并没有酿成大祸,但是正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海防逐渐开始废弛,天顺之后,沿海承平日久,明廷逐渐放松了沿海防卫,到嘉靖中期,海防已经废弛,造成了沿海地区倭寇日益猖獗,造成海防废弛的原因有很多。

(一) 政治腐败,宦官专权

正统至嘉靖前期海防建设的废弛,与当时明廷政府腐败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并不是十分直接,但却对海防建设影响深远,是海防废弛的根源。早在英

[收稿日期] 2008-09-14

[作者简介] 田秀娟(1982-),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2007 级研究生。

宗正统时，大地主阶级就凭借他们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到了天顺以后，土地兼并的风气越来越烈，特别是到了正德年间，这种风气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争相掠夺土地。广建“皇庄”是皇帝和宗室夺占民田的重要手段。据正德九年(1514年)的统计，畿内皇庄所占地竟达37595顷46亩。皇亲、国戚、宦官们兼并土地也十分猖獗，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如宪宗时的宦官王直竟然占“荒地”达2万余顷。除了皇、官庄的兼并外，各地地主兼并土地也十分激烈。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土地高度集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相继流亡，而赋税的征收，又加剧了农民的流亡。赋税，除了原来已有的相当沉重之外，这时又增加了一个所谓“赔纳”的负担。即某一地方的农民逃亡，他们原来负担的赋役就转嫁到还未流亡的农民身上。农民流亡越多，尚未流亡的人的负担就越重。负担越重，农民流亡越多，这样恶性循环，使流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天顺以后，流民几乎遍及全国。成化时，仅北直隶顺天府的流民就达到26.3万多户，72万多人。一些官吏贪污腐败也很严重，例如严嵩在内阁这个位置上长达21年之久，为首辅专权的时间也有15年之久，他结党营私，把儿孙们都安排当上了大官，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朝廷的各个部门。文武官员升迁，不论个人素质怎么样，都以送的银两多少来决定，军队中的军官们为了贿赂严嵩，不得不剥削士卒，而司法部门的官员为了贿赂严嵩，不得不搜刮百姓。当时，明朝边防军饷岁一年约百万之多，但有一半以上都贿赂给了严嵩。皇帝昏庸不理朝政，上下官僚贪污成风，搜刮百姓；抗敌有功的官员被杀害、被罢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倭寇乘隙而入。^{[20][21]}

宦官专权和肆虐，是明朝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同时又是明代地主阶级自身溃乱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英宗到武宗的几代皇帝，除孝宗略好一些，其他皇帝都昏聩无能，长期不问政事，于是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朝廷和人民的毒害也就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东厂和西厂建立后，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提督，这样就是宦官控制了厂权，加速了宦官专权的过程，到正德年间，宦官的权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宦官不仅在政治上窃取权柄，挟制内阁，而且在经济上严重干预财政，加速王朝的经济崩溃，他们还借采购宫用物品等的机会，搜刮地方百姓，弄得民不聊生，导致农民起义迭起，宦官专政造成统治危机，这时统治阶级也无力进行海防建设。

(二)明朝迁都北平，国防重点北移

朱元璋时期就有迁都北平的想法，但鉴于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侵犯的形式，并且由于北方在元末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地广人稀，经济凋敝；运河也没来得及修复，江南的粮食和物资无法大量地北运，他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把首都建在南京。北平作为首都确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北平地区的形势非常险要，背靠燕山，南瞰中原，左环渤海，右依太行，易守难攻。其二，明代边地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继续加强，各统治者在政治上都与明朝保持着隶属关系，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北平曾经是元朝的首都，离蒙古和东北都很近，又是东北与内地联系的必经之地，建都在这里既可以维系与东北的统治，又可以牵制蒙古族统治者的势力，其三，朱棣在北平起家，他巨大的影响和军事实力都在北方，对北平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直接促使了迁都。1421年，明朝迁都北平，这样国防重点就放在北方，虽然在整体上巩固了明朝国防，但也给倭寇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军事力量削弱

明初期设立了卫所制度，凡在卫所服役的军士都是世袭和终身，可携带家属在驻地成家繁衍，这在一定时间内对保持卫所地区所需兵力和人力的稳定起了稳定作用。但是军士的身份一旦确定，便世世束缚于卫所戍守地，从事戍守和屯田，从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并遭受军队首领的盘剥。卫所士兵的月饷只有一担仓米，除了自己用外还要供养妻小，加上卫所军官层层剋扣，就难以养家糊口，他们承担着繁重艰苦的差役，又遭受重重剥削和压迫，因此军官和军士的矛盾日益尖锐，一些军士为了摆脱贫困和处境，设法逃亡。据《明实录》记载：“沿海诸卫所官旗，多剋咸（减）军粮入己，以致军士艰难，或相聚为盗，或兴贩私盐。”^{[3][P25]}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世袭军户制度为基础的卫所制逐渐遭到破坏。明初法律严苛，军队将领也鲜有腐败现象，虽然士兵逃亡也时有发生，但数量不大。正统以后，一些军官为了得到缺额的月粮，对逃亡者多敷衍塞责，有的军官甚至索取贿赂，放任军士离去，以致军士逃亡数量越来越多，在沿海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卫所军队数量越来越少，所剩人员也多是老弱不堪，或身有残疾。而卫所的将官，多是纨绔子弟，这样的卫所当然不能抵御倭寇的入侵，卫所已经起不到防御外敌的作用了。

明初在沿海各卫都建有船只，并且建立了相应的水军，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水军舰船的破坏已相当严重，而且没有人修理补充，“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4][P54]}为了加强海防，明朝

在沿海建置了一些水寨，在这时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有的甚至已经毁废，如福建五水寨，原都设在岛屿要冲，自正统年间起陆续内迁。正统九年（1444），侍郎焦宏以烽火门水寨风涛汹涌，泊船不便为由，将其迁至一都松山。景泰三年（1452），侍郎薛希琏又以浯屿水寨其地孤远，上奏内迁，嘉靖初迁入厦门。南日水寨也在成化末年内迁。如此一来，不仅缩小了防御纵深，使海岸守备变成第一线，而且使倭寇以这些海岛为基地，取得了进攻大陆的主动权。由上述可知，到嘉靖年间，沿海卫所空虚，战船损坏严重，所剩无几，水陆均缺额在半数以上，所存士卒也多是老弱病残，既不能御倭于海上，又不能堵截于陆上，海防形同虚设，这也是倭寇猖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明朝的倭患，在很大程度上与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分不开的。明初，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对外贸易上，除为“怀柔远人”，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朱元璋表示“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来往”。^{[1][2]}即实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不准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期间更是弃守舟山等沿海岛县，以武力强迫沿海人民内迁，洪武年间（1368~1398）屡申“通番禁令”，规定“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等严刑酷法。又在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建立严格的“巡检”制度。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了防备张士诚、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仅在南洋一带建立了许多据点，而且和国内外的反明势力相联络，共谋反明，这不能不使明王朝十分警惕；二是倭寇问题，元朝时，倭寇就不断到中国沿海骚扰，入明后，为祸更烈，这成了明王朝推行海禁最直接的原因。可见海禁政策有对外对内

两方面作用，但实际只对大明的百姓起了作用，而对倭寇毫无作用，甚至间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永乐以后，明廷仍屡申“严私通番国之禁”，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但是后来在南方的广东发生葡萄牙人入寇西草湾事件和北方的浙江发生了日本两贡使的争贡事件引发了朝廷的进一步忧虑。基于这点与其他的种种原因，嘉靖政府屡下禁海令，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禁止下海捕鱼捞虾，断绝海上交通。凡违禁者，必依法处以极刑，使得这时的海禁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了各个时期。

明朝实行海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倭寇的侵扰，但是却起了相反的作用。随着嘉靖时期海禁政策的严厉，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而且政治腐败，官盗的勾结使得倭寇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因此明朝倭寇的愈演愈烈，对明王朝造成巨大的破坏与统治者所实行的海禁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

参 考 文 献

- [1]明太祖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1985.
- [2]纪红建.明朝抗倭二百年[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
- [3]明英宗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1985.
- [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 205[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范中义，仝晰纲.明代抗倭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刘向宏）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ast Defence Slack and Japanese invaders Rampanc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ian Xiu-jua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250014)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of all levels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ast defense.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ast defense of decades, the government of Ming regime had established a comparatively complete coast defense system with patrolling on the sea, guarding on land, and defending of the city coordinating with each other. At that time, Japanese invaders did not caused too much troubl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Ming regime. However, as the corrup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weakness of the military forces in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coast defense was gradually left uncared and discarded. The Japanese invaders became rampant and they brought great loss to the government of Ming regime and its people.

key word: Ming dynasty; coast defense; Japanese invaders

浅析明中后期海防废弛与倭寇猖獗

作者: 田秀娟, Tian Xiu-juan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刊名: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LIAON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 卷(期): 2008, 25(11)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条)

1. 明太祖实录 1985
2. 纪红建 明朝抗倭二百年 2006
3. 明英宗实录 1985
4. 张廷玉 明史 1974
5. 范中义, 全晰纲 明代抗倭史略 2004

相似文献(9条)

1. 期刊论文 易泽阳 俞大猷与明朝海防探微 -社科纵横 2009, 24(4)
 俞大猷作为明朝著名的水师将领,提出了“御海上,同海岸,守内陆”三个海防层次,并将此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一条完整的、有纵深层次的海防防御体系。同时,俞大猷还注重平战结合,注重后勤补给,注重武器装备,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海防思想。
2. 期刊论文 王日根 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范逃至海上的张士诚、陈友谅及倭寇等的侵扰,朱元璋加强了海防的建设,局部维持了沿海地区的安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积累,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沿海的防备越来越显出漏洞,海防设施内徙了,海上官兵逃亡了,沿海官员与盗贼相互多有勾结,商盗结合、商人武装化等现象都令明政府不断致力于加强海防,不断致力于加强对沿海官员的配备和调换,但倭寇、海贼等力量却越来越炽,官方或者借助客兵兴剿,或者竭力招抚,都没有肃清海氛。最后只能和成长壮大起来的郑氏势力联合,才形成了东南海上的安宁局面。
3. 期刊论文 胡长春 明朝名将谭纶的军事思想评析 -江西社会科学 2008(3)
 明朝名将谭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理论家。近三十年的军事斗争实践,加上他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感悟,形成了他丰富的而深刻的军事思想。本文从治军思想、战争指导原则、边海防战略、武器装备建设等方面,对其军事思想进行概略的评述分析。
4. 学位论文 赵红 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 2007

明代以前,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都来自北方,故统治者在边防问题上都重北轻南,重陆上,轻海洋。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西方世界掀起了第一浪高过一浪的航海高潮,一些西方国家陆续来到中国沿海,从而为中国的海防提出了新课题。再加上明清国内形势及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新动向,海防就成为中国日益突出的大问题。明清统治者在筹海问题上有得有失,中国近代海防的破败和落后挨打都可在明清找到深层的原因。
 目前,就明清区域海防史研究现状来看,存在“南热北冷”现象。学者们大都把研究目光放在了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南部沿海省份,对于山东海防的研究则几乎还是空白,至今尚未有专著面世。只是在一些论著和论文中偶有涉及。其实,山东海防是国家整体海防链条上极为重要的一环,并有不同于南方的特点。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析,不仅可以填补此项学术空白,有助于了解和把握明清时期中国海防的职能、总体战略规划、特质和实施效果等问题,而且对于探索明代以来中国海洋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有重要意义,从而为廓清西进中退的海洋迷思提供帮助,并为今天的海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鉴于海防研究牵扯面广,史料分散,本文不可能对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是侧重从军事角度,以山东海防建设为主线,对明清不同历史时段的山东海防对象、主体、手段、得失等方面进行论述。通过这种论述,探索海防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的互动关系,并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为此,本文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讨论。

第一章:明清时期的山东海疆行政区划和海防地理形势。海洋政治和自然地理因素对海防活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明清时期,山东海疆行政区划经过逐步调整,趋于稳定,区域视觉鲜明。山东海岸线绵长,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港湾众多。这些海疆要素,为山东海防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章:明代前期的山东海防(洪武至正德)。明代前期,山东海防主要是防御和抗击倭寇的侵扰而设,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建立到充实完善再到逐渐废弛的动态发展过程。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害较为严重的沿海省份之一。鉴于此,明朝政府在山东海疆初步建立了水陆配合的海防卫所体系。海防卫所体系发挥了稳定海疆的积极作用,同时蕴藏着诸多消极因素,为其日后的发埋下了隐患。永乐至宣德时期,山东沿海倭害相对减轻,山东海防在洪武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但仍存在弊端,并受到了国家某些既定政策的负面影响。正统至正德时期,山东沿海的倭寇事件鲜有发生。海疆的承平久日,政治的日趋腐败,致使明朝政府的海防建设力度不大,再加上卫所体系自身存在的弊端没有得到解决,山东海防逐渐废弛。

明代前期,明朝政府经营山东海防的作用并非都是积极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海禁政策的实行。海禁政策是一种消极色彩浓厚的海防政策,对山东海洋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明代后期的山东海防(嘉靖至崇祯)。明代后期,山东海防因时代的演变有了新的内容,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嘉靖年间,山东海防仍以防御倭寇为主。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出现了“嘉靖倭乱”。在这场斗争中,山东沿海亦发生了倭寇事件。但与南方沿海省份相比,山东的倭害轻得多。隆庆至万历中期,海防卫所体系已经破败不堪,日本又在朝鲜燃起战火,并想进而侵略中国,山东海疆安全受到威胁。严重的海防危机,迫使军界人士和明政府不得不认真思考海防问题。在这种合力作用下,山东海防得到了重建和发展,海防兵力、海防指挥体系、海防布局都出现了不同于以前海防卫所体系的变化。这是明代后期山东海防发展的高峰。万历中期之后,山东海防重任由防倭转为防卫后金(清)政权渡海南下。明末山东海防虽肩负重任,却未得到很好的建设,并随着明朝统治危机的日趋加深再度走向衰败。

第四章:清代前期的山东海防(1644-1840)。清代前期,山东海疆形势严峻,海防压力有增无减。清廷着手建立了以绿营和八旗相结合的水陆相维的海防体系。山东海防武力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顺治朝是初建时期,康、雍两朝发展到顶峰,乾隆以后则逐渐削弱。这折射出康熙时期的盛世与隐患并存的时代特征。山东海防的衰微,与清廷重陆轻海、消极防御的海防建设理念密不可分。清廷昧于国外情势,盲目自大,缺乏长远的世界战略眼光,也是重要因素。清初承明制,厉行禁海和迁界。海禁的实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要求开海的呼声从未停止,致使山东局部开海比南方要早。

第五章:山东海防与山东社会经济。海防除保卫海疆安全外,另一主要任务就是为沿海地区营建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谋求沿海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全面进步。而沿海社会的进步,又为海防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则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海疆开发的同时,也束缚了沿海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步伐。

第六章:明清时期山东海防的特点和得失。明清是历史上山东海防发展的关键时期。梳理这一时期的山东海防,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有鲜明的特点和得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透析这些特点,总结其经验教训,无疑可为今天的海防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5. 期刊论文 翟艳霞 邹维琏与明末福建海防 -阴山学刊 2003, 16(5)

明朝末年，闽省海防废弛，海盗红夷之患严重。邹维琏巡抚福建，督办海防，力剿海盗，平灭红夷，劳绩甚著，然而在昏暗的朝政旋涡中，本为建奇功者却成为罪人。

6. 会议论文 李庆新 隆庆、万历间明朝关于澳门问题的争议及其理性终结

自从正德间葡萄牙人闯进粤海，嘉靖中赁居澳门，明朝和广东官方对葡萄牙人的去留一直争议不断。隆庆、万历间，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发展东西方海洋贸易，势力发展迅速，同时也冲击明朝海防，不断引起官方的关注和争议：第一种意见主张把葡萄牙人全部赶出澳门，把贸易转移到浪泊外海，恢复嘉靖三十二年以前的外贸体制。与此相反，第二种意见不仅反对驱逐葡萄牙人，而且主张开放更多的口岸，供中外商客贸易。第三种意见主张在澳门设官置吏，把对葡萄牙人的管理纳入明朝地方行政体系之中。第四种意见主张让葡萄牙人继续在澳门居留贸易，加强管治。在朝廷默许下，广东当局采取第四种意见，仿照传统的蕃坊体制，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治措施，既加强对澳门的监控，又保证广东贸易的发展，澳门问题大致上以“双赢”结局画上句号。

7. 期刊论文 孙果清 明朝抗倭地图：《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 - 地图2007(2)

“沿海山沙图”是中国明代编绘的一种海防图，这种地图的产生与明王朝抗击“倭寇”有着直接关系。

8. 学位论文 徐娜娜 庙岛群岛在古代海上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研究 2008

庙岛群岛，位于黄渤海交界处，渤海海峡的中部和南部，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海上桥梁，又是京津门户，扼渤海咽喉，32个岛屿散落于渤海海峡上，岛屿之间的距离都在视线之内，航海条件极为便利。因此，从人类出现航海活动开始，庙岛群岛就在航海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个角度来论证庙岛群岛在古代海上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

首先，由于庙岛群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航海条件，在航海技术还很落后的先秦时期，我国先民们已探索出一条由登莱地区出发经由庙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继而沿岸前行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航路。秦汉之后，这条航路是中国南北政权间政治交往的海路首选，在唐中期以前一直是中日交通的主要航线，更是两千多年来中朝海上交通的最主要的路线。

其次，庙岛群岛是古代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海上用兵的军事根据地。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对东北及高句丽的海上用兵活动多是经庙岛群岛完成的。庙岛群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不仅是海路出兵的航路必经之地，又是中原王朝的军事基地。由于庙岛群岛具有易守难攻的天造地设之险，用兵过程中，可以此为根据地，储备粮草，屯田练兵，加强防备力量，以防敌人来袭；亦可以此为起航港，利用群岛上的驻军，发起军事攻击。宋代以来庙岛群岛的军事地位主要体现在其海防价值上。北宋与契丹对峙时，庙岛群岛是山东半岛北岸各港的前哨，而到了倭患严重的明朝以及西方列强入侵的清代，庙岛群岛则作为环渤海各港口的门户，站在了海防的最前线。可以说，庙岛群岛不仅对于登莱地区的海防有着重要的辅助功能，而且对于京津的防守有着深远的军事战略意义，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有很重的分量。

第三，经济 and 文化方面，庙岛群岛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远在史前时期，庙岛群岛已为人类古文明的传播与交流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元代行海运，庙岛群岛上的沙门岛（今庙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粮船必经之地之一。明代，河运淤塞则海运兴，河运疏通则海运废。海运仍是支撑朝廷运作的重要经济命脉。海运路线相对于元代有继承也有发展。庙岛群岛在海运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海运的兴盛促进了南北贸易的发展。而随着海运的发展，兴起于福建的妈祖信仰也逐渐传播到北方，庙岛显应宫成为北方第一座供奉妈祖的海神庙。由于沙门岛在古代海上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显应宫逐渐成为妈祖文化在北方的传播中心之一，为妈祖文化在北方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通过对庙岛群岛历史地位的论证，笔者对其地位给予了确定定位。庙岛群岛是中原王朝与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史上的海上联结点，是中原王朝在东北亚地区军事运作史上的海上桥头堡，是中国南北海运史上的海上集散地，是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文化传播的海上中继站，是南方妈祖文化北传的海上中心，在中国南北海上交通和中外海上交流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

9. 期刊论文 张荣生. Zhang Rongsheng 明代苏东淮南盐区的抗倭战争 - 盐业史研究2005(4)

发生在16世纪中叶的日本海盗集团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和该地区官民奋起进行反侵扰的战争，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政府与人民奋起开展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次预演。在这场血与火的战争中，与当时中国财赋重心扬州相毗邻的淮南通泰盐区是主要战场之一。战区的盐民武装与政府的官军互相合作，军民协同，经过反复较量，打赢了战争，巩固了祖国的东南海防。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njyxyb200811015.aspx

下载时间：2009年10月9日